

新工黨以勞工為名搞政治為實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看來李卓人已經放下了區選戰敗的陰霾，重新迎接新工黨主席的美夢。經過多番曲折，由李卓人牽頭的所謂新工黨終於定在今個月18號正式成立。由於多位具實力人士包括街工梁耀忠等拒絕加入，新工黨的組成都是舊酒新瓶，不是一些在立法會內勢單力弱、人微言輕的政壇個體戶如何秀蘭、張國柱，就是一些過氣舊電池例如被公民黨拋棄的張超雄。這樣一個失意聯盟聚在一起，表面上團結就是力量，但實際上不過是人多好辦事，在將來與其他反對派政黨爭取選舉好處時可以大聲一點。過去這些政壇個體戶早已不滿反對派的選舉協調機制只有利於大黨，現在集結起來，並非是為勞工爭取利益，不過是為了自身利益着想而已。

因利苟合 名不符實

由李卓人第一天提出要成立新工黨起，社會輿論早已不表樂觀，原因一方面如上所述，這個新工黨並非是為了捍衛勞工權益而成立，而是為了這幾個人的政治利益而苟合的。否則，外界倒可回想一下何秀蘭這麼多年來提出過什麼保障勞工利益的建議，說她是「忽然勞工」一點都不為過。而其他幾位雖然一直打着保護勞工權益的旗幟，但說到尾都是政治凌駕一切，在關鍵時候就會露底。就如在公民黨策動的外備爭取居港權一役，李卓人不但沒有出來批評公民黨靠害工人，反而不斷為公民黨開脫，說外備來港對基層工人影響不大，他是為公民黨發聲或是勞工發聲，不是一清二楚嗎？難怪在區選中以大欺小尚且要繳羽而歸。再看看其他幾位新工黨核心，也是沒有一言一語去反對外備爭取居港權，沒有為基層利益設想。在攸關勞工實際利益的問題上，可以因為政治的考慮而噤若寒蟬，還如何期望他們真心為勞工利益打拚？

事實上，這個新工黨的成立，由始至終不過是為了李卓人而設，其他核心成員不過是為了大樹底下好遮蔭而苟合在一起。按照事前公布的職位來看，李卓人在沒有對手之下肯定會成為新工黨主席，張超雄及何秀蘭將擔任副主席，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將會出任工黨紀律委員會主席，這四個人基本上已是新工黨的核心中的核心。然而，創黨核心雖有4人，但新工黨的組成基本上是李卓人一人力促成，落手落腳去拉攏各路人士，而自己也當仁不讓地表示會擔當主席重任，如果他的目的真的是為了加強勞工界的力量，那麼新工黨與過去的職工盟又有什麼分別，同樣是參政團體，同

樣參與選舉，將這些人都一併加入職工盟不是乾手淨腳嗎？

政治行先圓黨魁美夢

顯然，李卓人另組新工黨正正是為了與職工盟有所分工，始終職工盟必須以勞工議題為主，過激行徑難以留住會員，但新工黨卻可以保障勞工之名行「政治抗爭」之實，將李卓人的激進對抗路線「發揚光大」，將他在職工盟不便做得太過火的抗爭轉移在新工黨之上，與社民連、「人民力量」等爭一日之長短，否則難以解釋李卓人何以要另組政黨。可以預期，新工黨的政路線將是政治行先、勞工權益為次，結果是本港政壇不過是多了一個激進政黨，專門在議會內抗爭搞事，以阻撓政府施政、狙擊官員為首務，與激進反對派沆瀣一氣，試問這樣的一個所謂工黨，對勞工的權益有何好處？反而是變成了另一個激進反對派的俱樂部，勢令將來有關勞工政策的討論更加政治化，變成一幕幕的「政治騷」。在明年本港經濟極不明朗之下，這對於香港社會以及打工仔都非好事。職工盟在最低工資推行前故意挑動勞資對立的政治把戲，市民已經深受其害，新工黨出來後，未來的衝突只會愈來愈多，對勞工又有何好處？

李卓人千方百計要組建工黨，根本就是從政治角度出發，從自己的政治前途出發，既是一圓黨魁美夢，增加在反對派內的叫板籌碼，也是集合力量為自身的選情抬轎，確保在新界西的議席。新工黨是為了勞工還是李卓人，選用說出來嗎？不過，這個新工黨先天不足，加上後天失調，定位錯誤，很大機會淪為另一個泡沫化政黨。

關注長者乘巴士的安全

美恩

站」，也要準時到達總站終點，心裡壓力匪淺。若然乘客本身年紀不輕，便應該要點自知之明，將自己放在適當的位置，而不是還當自己年輕般往往在巴士上「向上爬」。據知，在巴士梯間跌死的事件，並不是沒有發生過，在09年初，便有一名82歲的老翁在巴士停站前從梯間跌倒受傷，送院後證實死亡。

人貴自知，每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所在，知道什麼階段做什麼事情，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強自己所難者，非但難於成事，更會導致意外發生，甚至連累他人。筆者無意在此落井下石，又或歧視長者，而是希望借今次意外，再次向長者、或行動不方便者作出叮囑，希望他們能加強警覺意識，除了緊記在巴士內緊握扶手之外，還要懂得將自己的身軀放在最適當位置上，亦即是巴士下層。雖然，坐於下層座位未必代表沒有意外發生，但起碼可將出亂子的機會減至最低。

義工精神 社會力量

聶德權 社會福利署署長

上月底花園街一場無情大火，奪去了多人寶貴的生命，也令數十人受傷，還有數十個家庭受到影響，實在令人心痛和惋惜。連日來，社會福利署（社署）及相關政府部門一直積極善後，致力為死傷者家屬及其他災民提供支援。與我們攜手努力的，還有不少慈善團體及義工朋友，充分體現了香港的關愛精神。

還記得發生火災當日，當我探望暫住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的災民時，除了政府人員努力為災民提供情緒支援及跟進他們的生活需要外，例如提供緊急現金援助、膳食及生活用品等，也有義工團體主動前來為災民提供額外的物資，為他們增添溫暖。

自發支援災民 體現關愛精神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義工朋友的細心和體貼。當我兩日後再到社區中心探望災民的時候，赫然發現中心的一角已經變成受災小朋友的小天地，他們跟義工一同學做手工，心情比之前開朗不少。

義工對我說，受災家庭的父母大多忙於處理災後的事務，對小朋友的關注自然少了。為了讓他們得到照顧和感到被關愛，義工特別設計了一些活動，例如以舊物料循環再造錢箱、透過一剪一貼，把祝福字句成為創作主題，小朋友不但能善用空閒時間，其情緒還能盡快平復過來。更有義工把原本買給親友的嬰兒服裝轉贈予中心內的嬰孩，這都是人間有愛的表現。

動人的事其實不只一二。在各部門的努力下，政府在數日內已安排無家可歸的災民入住石籬臨時收容中心，臨時居所的水、電、基本設備和電器亦準備妥當。要為50多個家庭逾100人搬遷，可算是一次具規模的行動。我們感謝超過100位義工朋友的參與，令有關搬遷行動能更順暢地進行。

義工們分工合作，一些幫助受災家庭執拾，一些幫助他們搬運，一些特別陪伴及照顧老弱，提供情緒上的支援，到步後更扶他們上樓，還教他們使用室內的設備和電器，幫助他們盡快融入新的環境和開展新生活。

將義工精神融入日常生活

由此可見，義工確實是寶貴的社會資本和社會力量。社署自1998年開始推展「義工運動」以來，香港的義工隊伍日益壯大。截至本年11月底，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已經超過2,230個，登記義工人數達98萬人，他們在2010年共提供了超過2,200萬小時的義務工作。

德蘭修女曾經說過：「我不做大事，但我會以最大的愛心，做生活中每一件最小的事，服務最卑微的人。」這一句話，也許說明了義工服務的核心價值：即使我們每人只付出一點一滴，只要能夠齊心協力，去幫助最需要的人，我們也能發揮極大的力量。

最近，我們以「義工·生活新態度！」作為義工運動的主題和口號，鼓勵全港市民將義務工作的精神及核心價值融入日常生活，成為一種生活態度，讓義務工作成為生活一部分。我期望社會各界能積極參與及支持。

兩地文化合力影響世界

章升

香港，因歷史原因與祖國分隔，又在歷史前進的步伐中回歸祖國。其文化，一面傳承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一面又吸收融合外來文化，具有獨特的面貌與內涵，為中國文化注入新鮮多元的因子。內地文化則在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擺脫之前的單一蒼白，日趨具有活力。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文化向內地的輸入「攪動一池春水」，為內地文化擺脫禁錮、走向開放發揮了影響，而隨着內地文化的不斷發展，又逐漸為香港文化帶來借鑒。兩地文化從單向傳播趨向相互交流，繼而合力影響世界。這種變化歷程，可從文學、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等兩地文化交流最主要與最顯著的方面去觀察。

香港通俗小說引發內地閱讀潮

香港文學以武俠、言情、科幻等通俗小說為主流，內地文學則以嚴肅文學為倡導主旨。因社會寬鬆自由，加之各大報刊連載的推波助瀾，香港通俗文學發展興盛。改革開放之後，內地文學也開始顯露多樣面目，但與讀者極大的閱讀渴望相比，其發展仍不能提供滿足，這時新奇有趣的香港通俗文學傳入內地，很快引起千人傳聞的熱潮。

改革開放之前，香港作家唐人的《金陵春夢》在內地悄悄流傳，這是內地讀者最早看到的香港小說。改革開放之後，1981年，香港作家劉以燾的《天堂與地獄》、海辛的《寒夜的微笑》、唐人的《黑裙》等短篇小說出版，這是進入內地的一批香港文學作品。

與此同時，通俗文學作品搶登內地文壇。1980年10月，廣州的《武林》首先刊登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金庸的武俠小說既吸收古典小說的精華，又借鑒西方現代派藝術手法，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此後逐漸進入內地的武俠小說作家還有梁羽生、古龍、溫瑞安、黃易等。緊跟金庸而來的亦是亦舒的言情小說。亦舒善於書寫上層女性知識分子對婚姻的追求，愛情的失落、痛苦與掙扎。由於內地改革開放之後，讀者正渴望着感情的滋潤，因此亦舒的小說也很暢銷。倪匡的科幻小說大約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零星進入內地的，直至1988年才有《地圖》、《迷藏》、《透光明》等幾部作品在內地出版。倪匡愛對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未被認識的「謎」一樣的事物作大膽的猜測或解釋，引起讀者極大興趣。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極文藝出版社各出了梁鳳儀的一批作品，其時內地正掀起市場經濟大潮，商業理財小說熱也逐漸形成。李碧華的小說進入內地大約在20世紀末，花城出版社為其出版了《李碧華作品

集》一套，她敢於大膽解構經典，如梁祝故事，這對內地讀者來說是一種奇異的閱讀感受。

總體上看，香港文學作品進入內地是與改革開放同步的。嚴肅文學作品打頭陣，但影響微弱；通俗文學後來居上，影響巨大。隨着兩地文學界交流的深入，香港嚴肅作家如西西、董啟章等在內地讀者中也開始引起重視。而內地重要作家莫言、余華、蘇童、畢飛宇等也逐漸成為香港讀者閱讀的對象，特別是在各大獎項中獲獎的作家（蘇童作品《河岸》獲曼布克亞洲文學大獎、畢飛宇作品《玉米》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他們的作品在香港能夠得到快速的傳播。此外，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內地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因其時代感容易獲得香港讀者認同，都一時風靡香港。

合拍電影漸成主流

香港電影是中國電影史的傳奇。從1977年開始，內地電影院開始放映香港電影，恐怖片《畫皮》、歷史片《屈原》、喜劇片《三笑》、時裝片《巴士奇遇結良緣》等讓內地觀眾看到了香港電影的豐富多彩。1982年，「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影廠合併成立了銀都機構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銀都機構利用自己豐厚的內地資源，拍出了轟動一時的《少林寺》。《少林寺》在內地是一個神話，一時萬人空巷。《少林寺》之後不久，更多類型的香港電影進入內地觀眾的視野。李小龍的《唐山大兄》、《精武門》，成龍的《醉拳》、《警察故事》，還有《英雄本色》系列、《賭神》系列、《倩女幽魂》系列、《黃飛鴻》系列、《逃學威龍》系列……李小龍、周潤發、劉德華、周星馳等影星在內地名噪一時。不僅如此，具有獨特風格的香港導演吳宇森、杜琪峯、王家衛、許鞍華等都以其一部又一部的優秀之作，得到內地觀眾的喜愛。

而在香港電影不斷湧入內地的同時，兩地合拍也在逐漸形成氣候。《少林寺》就是合拍片的一個成功例子。此後，香港電影人開始與內地進行規模的合作拍攝。其中，1992年香港與內地聯手打造的《霸王別姬》，不僅票房大賣，還奪得了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也是在這一時期，香港片商開始頻頻對內地劇本創作和拍攝進行投資，比如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等，這些影片幾乎都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贏。

時至2004年，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其中利於香港合拍片進入內地市場的新規定使電影人興奮不已。《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傷城》、《赤壁》……動輒上億投資的豪華巨製拉開了「大華語時代」的帷幕。經過多年的嘗試與磨合，如今的合拍片發展也日趨成熟。近期所放映的《關雲長》、《倩女幽魂》、《肩上蝶》、《單身男女》等合拍片不僅佔據了影院的大半江山，而且在類型上比早前的合拍片更為豐富，在運作上也更加成熟，並且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兩地電視劇各具風采

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電視工業正和香港的經濟一樣處於黃金時期。香港兩大商業電視台亞洲電視和TVB旗鼓相當。內地認識的第一部香港電視劇《霍元甲》是亞洲電視台的作品。《霍元甲》在內地興起了一股習武練武的熱潮。

《霍元甲》餘波未散，1984年，一部至今仍被稱為華人電視巨作的《射鵰英雄傳》迅速在全中國開播，自此香港的武俠電視劇成為內地觀眾的最愛。在上世紀80年代播出了200多部香港電視劇，有80%是以古裝為主。其中至今仍被視為經典的有《天龍八部》、《神鵰俠侶》、《雪山飛狐》、《八仙過海》等。同時，香港的歷史戲說電視劇也成為另一個重要的題材，以《武則天》、《秦始皇》、《少女慈禧》最轟動。20世紀80年代後期，一大批香港現代劇出現在內地熒屏上，其中以警匪劇和倫理劇最受歡迎，代表有《蠶鷹》、《流氓大亨》、《義不容情》、《我本善良》、《法網柔情》等。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TVB金庸新武俠連續劇又一度成為內地電視台的收視冠軍，如《神鵰俠侶》、《鹿鼎記》、《天龍八部》等。2000年到來時，一部100集的大型商戰題材的億元之作《創世紀》再次引起轟動，成為近幾年港劇在內地觀眾心目中新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內地電視劇得到迅速發展，逐漸進入香港觀眾的視野。內地電視劇由上世紀90年代初登陸香港，最初幾乎全為歷史類的古裝劇，例如《紅樓夢》、《水滸》、《雍正王朝》、《康熙帝國》等，一直都屬「小眾文化」。之後，多種類型的內地劇開始出現在香港電視熒幕之上。《還珠格格》、《大宅門》、《鐵齒銅牙紀曉嵐》、《黑洞》、一直到近來的《潛伏》、《蝸居》，內地電視劇成香港觀劇新亮點，引發街談巷議。這表明內地電視劇作品已經具備相當實力。但是如果要保持這一勢頭，內地電視劇還需在創作轉型之路上走得更遠。

流行音樂創作需共同努力

上世紀80年代，內地流行音樂還沒有開始興盛，台灣的流行音樂也沒有正式的渠道可以進入，香港成了內地獲得流行音樂最主要的途徑。

1984年《譚詠麟獨唱精選集》為內地聽眾帶來了不一樣的東西，粵語歌曲也在內地顯現出了它的獨特魅力。譚詠麟和張國榮的競爭成了這個時期的主題。女歌手方面，則是梅艷芳一枝獨秀。在《譚詠麟獨唱精

選》取得市場上的成功之後，引進了這盤合輯的廣東某唱片公司在第二年又用相同的模式陸續推出了《張國榮精選》、《張學友精選》、《達明一派精選》……香港粵語音樂開始輝煌的時期，也是香港音樂融入內地市場的時期。進入20世紀90年代，香港歌壇的旗幟性人物自然就是「四大天王」。張學友、劉德華、黎明、郭富城幾乎包攬了那10年間所有的獎項，也成為內地歌迷的一代偶像。

與此同時，內地原創的流行音樂在廣東興起，廣東一度成為內地的流行音樂中心。毛寧、楊鈺瑩等歌手，《濤聲依舊》、《心雨》等歌曲都風靡一時。這段時期，一些內地的歌手也開始到香港發展，一些內地音樂人創作的歌曲也開始被香港音樂界關注，如內地音樂人李海鷹的《彎彎的月亮》經香港歌手呂方的演唱，傳唱香港。1997年的香港回歸為兩地流行音樂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變化。如今，香港音樂人和內地音樂人的合作已經越來越頻繁。

然而，21世紀網絡時代的到來給流行音樂市場帶來很大衝擊。因為盜版猖獗，流行音樂可以輕易從網絡下載，CD銷量也因此銳減，很難恢復到1980、1990年代流行音樂唱片大賣的時光。流行音樂開始表現出式微之勢，兩地有影響的歌手和作品也越來越少。不過，亦有不懈努力者，除了將音樂製作得更好，也積極探索在網絡上行銷作品的新方式，這不僅促進了流行音樂文化的發展，也將流行音樂創作帶入一個新時代。

文化融合提升國際影響力

兩地文化不斷融合，新的文化面貌也隨之逐漸形成。由於兩地最容易溝通與形成共識的文化集中於中國傳統文化，故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詮釋或重新演繹，成為兩地文化交流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這一主題的開拓，使得香港文化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得到增強，提升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這突出表現在合拍電影的題材選擇上，如《赤壁》、《關雲長》、《白蛇傳說》等等。由於香港文化中外來文化對傳統文化的觀照，使得這些傳統題材呈現出新的內涵，不僅具有時代感，同時具備國際性，提升了國際影響力。近幾年內地票房排行中，兩地合拍片佔有重要分量，這說明合拍片的質量得到了觀眾的認可。中國每年向外輸出的影片中大部分票房也來源於合拍片。

兩地文化的融合，還表現為各自取長補短。由此，香港文化多了幾分厚重，內地文化變得更為開放。在今年的香港書展中，內地參展商數量較去年增加25%，而隨着港人對內地圖書需求愈來愈大，內地圖書在香港的銷售額也每年遞增。這不僅僅滿足了香港讀者對內地文化的渴望，更重要的是，由於內地文化的大規模展示，使得香港在國際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得以提升，而內地文化借助香港這一國際都市的平台也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和更深刻的認同。

(本文轉載自2011年12月號《紫荊》雜誌。)